



诗诗歌的创作

顾城著

詩詞歌詞創作

钟子



陕西人民出版社

论诗歌的创作

钟子翹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字数 143,000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

统一书号：10094·277 定价：0.55元

目 次

一、必须深入生活获取创作源泉.....	(1)
二、深刻认识诗歌的基本特征	(17)
三、切实遵循形象思维的创作规律.....	(53)
四、正确解决诗歌创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75)
(一) 诗歌的艺术构思	(76)
(二) 诗歌的意境	(95)
(三) 诗歌的典型化	(115)
(四) 诗歌的含蓄	(134)
(五) 诗歌的夸张	(149)
(六) 诗歌的议论	(163)
(七) 诗歌的艺术独创性	(179)
(八) 诗歌的民族化、群众化	(195)
(九) 诗歌的语言	(213)
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放声歌唱	(228)
后记.....	(230)

一、必须深入生活获取创作源泉

诗歌创作，是一种紧张而艰苦的复杂劳动，同时也是一种愉快而幸福的审美活动。所以，过去的诗人，一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要呕出心血乃已”^①的历史记录；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留下了“得句从来胜得官”^②等创作经验之谈。

古今中外的创作实践证明，一个诗歌作者，要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优秀诗歌，必须具备下列三方面的条件：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的经验；正确的立场和世界观；精湛的诗歌艺术修养和艺术创造本领。必须成功地解决下列两方面的问题：正确、深刻而独特地感受和认识社会生活；按照诗歌的特点和创作规律，艺术地创造性地反映社会生活。否则，创作出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诗歌，那是难以想像的。

十多年来，由于“四人帮”对文艺事业进行疯狂的干扰和破坏，我们的诗歌园地，遭受了一场空前的灾难：诗歌的源流关系被他们彻底颠倒了；诗歌的基本特征被他们一概抹

①《新唐书·李贺传》：“李贺，……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母使婢探囊中，见所书多，即怒曰：‘是儿要呕出心血乃已耳！’”

②汪康古诗句，引自朱竹垞《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三。

煞了；诗歌的创作规律被他们无端否定了；诗歌的美感作用被他们完全取消了；有关诗歌创作的一切正确理论，诗歌创作者和诗歌爱好者的思想，也被他们放肆地搅乱了。因此，在诗歌创作中，真理的声音消失了；生活的光辉暗淡了；政治概念的堆积、标语口号的搬弄，代替了艺术形象的刻划和动人意境的描绘；虚伪造作、装腔作势的呼喊，代替了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什么形象的思维，精巧的构思，凝炼的语言，优美的形式，和谐的韵律，什么真实性、艺术性、诗意、诗味和诗美，仿佛一切都是多余，似乎与诗歌创作根本无关。致使那些不是诗歌的“诗歌”，俨然冒充为“革命诗歌”，那些不是诗人的“诗人”，荒谬地被封为“革命诗人”；而那些真正的诗歌和优秀的诗人，却遭到横暴的批判、无情的摧残和非法的禁锢。真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百卉凋零，凄凉满目。其流毒的深广，为害的严重，影响的恶劣，的确是旷古未有，令人触目惊心。

今天，万恶的“四人帮”，虽已被人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其流毒却远没有彻底肃清。为了迅速发展和繁荣我们的诗歌创作，提高我们诗歌创作、欣赏和批评的水平，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诗歌艺术的期望和要求，充分发挥诗歌特殊的社会作用，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必须首先在思想和理论方面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对诗歌作者来说，深刻认识和正确解决诗歌创作和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有着更为迫切、更为现实的重要意义。必须深入生活获取创作源泉，应成为我们创作的指南。

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它犹如哲学中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一样，历来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历来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在文艺领域中斗争的重要焦点之一。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他们倒行逆施，散布了种种反动的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观点，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蓄意歪曲和颠倒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张春桥公开鼓吹：“报纸是作家接触生活的基地”^①；姚文元胡说什么：“《诗经》是几千年中国旧诗的源头。……对中国诗的现实主义方向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新民歌的产生，……为专业诗人发展自己的创作，从人民口头创作中吸取灵感，提供了最丰富的泉源”^②；江青发明并强制推销所谓“三突出”的创作原则，疯狂反对“写真人真事”，叫嚣不允许作品中出现“生活原型”；他们荒谬地规定：文艺创作必须“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必须按主题去找题材，按题材去找人物，按人物去找情节……；他们拚命宣扬所谓“三结合”的“集体创作”方式，指定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等等，等等。其罪恶的阴谋和目的，就是否认社会生活是文艺唯一源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反对作家深入生活和真实地反映生活，为他们摧残革命的作家和作品，炮制“阴谋文艺”，变文艺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

①引自 1976 年 12 月 4 日《光明日报》。

②姚文元：《在前进的道路上》，第 207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具而制造理论根据。他们清楚地知道：生活是文艺滋生和成长的土壤，一旦割断了文艺作家及其创作与生活的联系，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就不可能反映出现实真实的面貌，传达出人民群众的心声，这恰恰符合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而“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等等，实际上等于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出发，等于遵从他们的反革命意图进行编造。这样，整个文艺必然会落入他们的掌握之中，为他们反革命的政治路线服务。与此同时，他们又利用窃夺到手的文艺大权，一方面，大树特树他们御用的文人，给一些“阴谋文艺”戴上种种桂冠，捧到九重天上；另一方面，疯狂围剿一切革命作家和优秀作品，横加种种罪名，打入十八层地狱。真可谓千方百计，用心良苦。

在这种反动的文艺路线、文艺思潮和恶劣风气的影响下，我们的一些诗歌作者，对诗歌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认识，逐渐模糊了起来，深入生活的观念，逐渐淡薄了，甚至是忘记了。少数追逐名利的诗歌作者，把观察政治风向、猜测编辑意图，放在首要地位。不管自己有无生活基础、真情实感和创作激情，只要认为有发表的可能，就凭借一些空洞的政治概念，即兴挥毫。根本不熟悉的题材，他可以运用想象进行编造；某一要人的只言片语，他可以抓来作为诗歌的主题；重大的节日尚未来临，节日抒情的诗稿，早已寄到刊物编辑的手中；走马观花式的生活经历，他有本领编织成有头有尾的故事，写出几百行叙事长诗。许多年轻的诗歌作者，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知识和很好的诗歌艺术修

养，误信“三突出”是诗歌创作必须遵循的原则，“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是不可违背的金科玉律。或认为增强诗歌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就是要高喊革命口号，直接讲说革命道理；或认为提高诗歌的艺术质量，就是要堆砌华丽词藻，追求形式和技巧。而广大的青年诗歌爱好者，由于看到的是些公式化、概念化的诗作，听到的是“三突出”之类的谬论，耳濡目染，也错误地认为创作诗歌比较容易，无须深入社会生活，随便想个题目，顺口溜它几句，凑上几个韵脚，一首诗歌就创作成功了。诸如此类的情况，充分说明“四人帮”的流毒，对诗歌创作影响的深广和严重。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使得许多诗歌创作，较普遍地患有生活贫乏症，既缺乏真实性，也缺乏艺术性，浮泛空洞，了无诗意，读起来味同嚼蜡，难以终篇。真正能扣动读者的心弦，唤起人们的美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百不得一。直到今天，染有这种后遗症，习惯于图解概念、空喊口号的诗歌作者，也还大有人在，公式化、概念化和缺乏真实性，也仍然是我们诗歌创作中一个较普遍而严重的缺点。如果我们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的话，深刻认识和正确处理诗歌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应该说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曾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不是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17页。

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列宁也说：“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②。毛泽东同志更明确地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③。诗歌和其他文艺一样，无不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反映。离开了社会生活，它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一些诗歌作者都可能是知道的，或会谈得头头是道；但要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地贯彻于实践，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今天，对这个问题，尤其有突出强调的必要。每个诗歌作者，都应很好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对此须有深刻的规律性的认识，用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

诗歌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创作诗歌必须有深刻的生活感受，这唯物主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古代的文艺家们，也早就有所认识并加以强调了。例如：古希腊的哲学家亚理斯多德（公元前 384 年—公元前 322 年）就认为：诗是人生的模仿；诗人是一种模仿者，“必然在三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2 页。

②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68 页。

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种方式中选择一种去模仿事物：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模仿，照事物为人们所说所想的样子去模仿，或是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①。罗马帝国初期的大诗人贺拉修斯（公元前65年——公元前8年），也肯定艺术应“模仿自然”。认为创作的源泉是现实生活，作品要真实地反映现实，作者必须自己深入地体验生活。他劝告作家“到生活中到风俗习惯中去寻找模特儿，从那里汲取活生生的语言”^②。后起的许多诗人，对此更为强调。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公元1749年——1832年），曾明确宣称：“我的诗都是即兴诗：从现实受到暗示，以现实为基础的。我不尊重凭空虚构的诗”^③。马克思曾给以高度评价的法国伟大的诗人贝朗瑞（公元1780年——1857年），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通向理想的途径是自然。艺术，……必须沿着这一途径前进。”“艺术的美可能只有通过对真实的东西的选择才能达到”^④。被马克思誉为“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⑤的英国革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公元1792年—

①亚理斯多德：《诗学》（第25章），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第58页。

②贺拉修斯：《诗艺》，《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2期第63页。

③爱克尔曼：《哥德对话录》（周学普译）第9页，商务印书馆版。

④伊瓦肖娃：《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第194页，杨翰周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二）第2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1822年），也这样说过：“诗是生活的维妙维肖的表象，表现了它的永恒真实”^①。德国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海涅（公元1797年——1856年），在《论浪漫派》一书中，指责一些诗人是“死亡的诗人”，而不是“生活的诗人”。他要求诗人象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当他的脚接触到大地母亲时，他永远是坚强的、不可战胜的，只要赫古列斯把他诱到空中，脚离开了大地，他就失去了力量），并说：“诗人在他不离开现实的大地时，是坚强有力的，只要他空想地在蓝色的空中翱翔，他就变得软弱无力了”^②。显然，这些闻名世界的西欧诗人，无不认为诗歌的源泉是社会生活，要创作出优秀的诗歌，诗人必须深入社会生活，获得创作的源泉。

在我国，古代文艺家们诸如此类的论述，俯拾可得，不胜枚举。《诗经》中一些诗歌的作者，就已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们的诗歌来自社会生活，是有感于生活并为改变生活而作的。例如，《魏风·葛屦》的作者缝裳女子，在诗的末尾写道：“维是褊心，是以无刺”。意思是因为这个好人心胸褊狭，所以作一首诗来讥刺她。《陈风·墓门》的作者，在诗中写道：“夫也不良，歌以讯之”。意思是那个人干了许多坏事，我作这诗来警告他。《小雅·节南山》的作者家父，在诗中也说：“家父作诵，以究王讻”。意思是我作这诗，是用以彻底揭露周王的罪恶的。此外如：《魏风·桃有园》

①雪莱：《为诗辩护》，《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82页。

②冯至译：《海涅诗选》第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的“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小雅·巷伯》的“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等等，对诗歌来源于社会生活，作诗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或表达自己的意志，都说得十分清楚。正因为这样，所以“诗言志”说，成为我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①。孔颖达曾这样解释“诗言志”：“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诗作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②。这更具体地说明了诗歌产生于诗人生活感受的基础上，来源于社会生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既指出“春秋之后，……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又指出“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就是说，不管是文人诗赋，还是民间歌谣，都是源于社会生活，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几千年来，“诗言志”、“感物吟志”的诗论，在我国的诗歌创作论中，一直占主导的地位，这绝不是偶然的。

我国古代的文艺家，不仅认识到诗歌源于生活，是感物

①朱自清：《诗言志辨序》，《诗言志辨》。

②孔颖达：《诗大序正义》，《毛诗正义》卷一。

吟志的，而且有些人进一步认识到诗人生活感受的深刻性、丰富性，对其创作有决定性的影响。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指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①，在《荆潭唱和诗序》中也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②。欧阳修进一步发挥了韩愈的这种观点，明确指出“诗穷而后工”。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明确地写道：“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③。在《薛简肃公文集序》中也说：“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苦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④。所谓“穷而后工”，确切地说，就是深入生活，有了丰富而深刻的生活感受而后工。这是符

① 《昌黎先生集》卷十九。

② 《昌黎先生集》卷二十。

③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二。

④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四。

合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诗穷而后工”理论的提出，引起了后来一些诗人对深入社会生活问题的重视，不断地得到重复和发挥。例如，陆游曾告诉他的儿子：“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①。这诗外的工夫，指的就是深入体验现实生活、加强品德的修养。王若虚论诗也强调指出：“眼处心生自有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②主张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创作源泉，而反对模拟风气。焦竑论诗也着重指出：“古之称诗者，率羁人怨士，不得志之人，以通其郁结，而抒其不平，盖《离骚》所从来矣。岂诗非在势处显之事，而常与穷愁困悴者直邪？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苟其感不至，则情不深，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垂世而行远”^③。这就结合诗歌创作的特点，阐述了“诗而后工”的原因和深刻感受生活的重要意义。黄宗羲更突出强调深入时代生活，才能有真实浓烈的情感，才能创作出优秀而感人的诗歌。他十分赞扬黄孚先的“身之所历，目之所触，发于心著于声，迫于中之不能自己，一倡而三叹，不啻金石悬而宫商鸣也”的诗论，同时指出世人“情随事转，事因世变，乾啼湿哭，总为肤受，……其发于心著于声者，未可便谓之情”，因为这是“习心幻结，俄顷销亡”^④的虚伪的感情。他认为诗盛于乱时，“是故汉之

①陆游：《示子遹》，《剑南诗稿》卷七十八。

②王若虚：《论诗诗》，《滹南遗老集》卷四十五。

③焦竑：《雅娱阁集序》，《澹园集》卷十五。

④黄宗羲：《黄孚先诗序》，《南雷文案》卷二。

后，魏、晋为盛；唐自天宝而后，李、杜始出；宋之亡也，其诗又盛”；“即时不甚乱，而其发言哀断，不与枯荄变谢者，亦必逐臣、弃妇、孽子、劳人”^①。而王夫之则斩钉截铁地指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②。就连有严重复古倾向的钱谦益，也认为深刻的生活感受是为诗之本。他曾说：“古之为诗者有本焉。国风之好色，小雅之怨诽，《离骚》之疾痛叫呼，结缡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偏侧时命连蹇之会，梦而噩，病而吟，春歌而溺笑，皆是物也。……”^③。不难看出，“诗穷而后工”一类的诗论，千百年来，乃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我国诗论的一个优良传统，是无数诗人创作实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如果论其渊源，那么，应该说并非始自韩愈，而实始于汉代的司马迁。

诗人深入生活对其创作的决定性的影响，文学史上的实例，也多不胜数。司马迁就曾指出：“屈原放逐，著《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④。钟嵘评李陵时写道：“文多凄怆怨者之流。……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⑤！苏轼论杜诗时曾说：“古今诗人众矣，

①黄宗羲：《陈苇庵年伯诗序》，《南雷文案》附《撰杖集》。

②王夫之：《董斋诗话》卷二。

③钱谦益：《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有学集》卷十七。

④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百三十。

⑤钟嵘：《诗品》卷上。

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①？谢榛论杜甫时也说：“子美不遭天宝之乱，何以发忠愤之气，成百代之宗”^②。白居易的创作道路，更为典型。他前期积极地深入和干预生活，“惟歌生民病”^③，所写的《秦中吟》等“讽谕诗”，脍炙人口，千古流传；后期意志消沉，脱离了现实生活斗争，所写的“闲适诗”，就大为逊色了。陆游的创作道路，恰与白居易相反。早年他受“江西诗派”的影响，注重形式技巧，诗作成就不高；中年入蜀从军南郑以后，广阔的现实世界，丰富的战地生活，才使他悟得“诗家三昧”，创作出许多爱国主义的光辉诗篇，成为杰出的爱国诗人。《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一诗，便是他转变过程的形象的总结。他写道：“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前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④这里所说的“诗家三昧”，主要就是生活实践和诗歌创作的密切关系。此外，如文天祥的诗歌创作，以起兵抗元为分水岭，前期多无聊的应酬，甚至相面、卜卦也在诗中占相当的比重，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平庸；但后期却多慷慨悲壮、沉痛感人、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

①苏轼：《王定国诗叙》，《苏东坡集》卷二十四。

②谢榛：《四溟诗话》卷二。

③白居易：《寄唐生》，《白氏长庆集》卷一。

④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五。